

#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亚元

乔小明<sup>1</sup>, 吴兮<sup>2</sup>

(1.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昆明 650092 2. 云南省证券交易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 650000)

**摘要:**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参与东亚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途径。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各区域加快了其内部的货币联盟, 亚元便是在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氛围中催生的。为了稳定亚洲的货币市场, 近年来在东盟及“10+3”机制框架内, 亚洲各国也进一步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 率先启动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比东盟与日本、韩国的合作更具有优越性和旺盛活力。中国可以借助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货币融合, 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取代日本主导区域货币亚元的构建。

**关键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 和平崛起; 亚元

全球化、区域化时代的国际战略格局, 已经不再单纯是由大国构建的传统意义上的全球结构, 而是由依托各自区域的大国构成, 逐步形成大国间新的竞争与合作的局面。这一切给国际战略格局带来了新的结构特征。冷战结束后, 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 开始了以地区为中心的聚合发展, 欧洲、北美和东亚三大地区性经济区逐渐成型。在区域化的时代背景下, 我国为了应对新的国际战略格局, 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崭新理念, 其实质上是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破解大国崛起必然带来冲突与战争的历史逻辑命题。中国借由区域一体化从地区和平崛起, 再走向世界, 这是新时期大国崛起的必经之路。由此, 中国的和平崛起需主动、积极地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倡导东亚区域一体化。从地缘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来看, 与东盟结成紧密的经济合作体对于我国的和平崛起发挥着相当程度的溢出效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东亚合作而言, 无疑是关键的一步。有利于培育中国成为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力量, 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和东盟都需要通过成立连接双方的自由贸易区作为构建大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框架和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加深, 特别是2001年以后中国对东盟各国每年都保持着300至4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充分表明了我国已经把东盟的经济纳入自己世界工厂的产业链中, 双方要求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呼声日趋高涨, 在这种条件下, 于2001年11月6日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召开的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 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正式提出了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 并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 确定新世纪初的重点合作领域, 即根据双方各自经贸优势, 把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开发作为近期合作的重点领域; 第二, 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在今后10年内, 正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第三, 加强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持, 在不断拓展双方经贸合作的同时,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政治对话与合作, 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到了2002年11月, 第六次东盟和中国领

导人会议上, 各国首脑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CAFTA), 随后在2003年开始了有关自由贸易区建立的谈判。到了10月份的第七次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各国发表了联合宣言,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并且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使双方政治关系有了突破性发展, 为自由贸易区如期建立提供了政治保障。由此,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模式基本成形。

中国与东盟“10+3”框架下率先启动自由贸易区进程, 是对东亚合作的重要贡献, 必将对东亚地区的融合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既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与历史前进的方向相一致, 又应对了国际战略新格局带来的挑战, 符合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启动于2002年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突破, 其对实现和平崛起的大战略将产生深远影响和一定的战略价值。同时, 由于当今国际货币体制的缺失使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东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迟钝与失误是成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构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应该认识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定位不仅仅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还有较高层次的货币合作和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协调。我们要重视中国——东盟的汇率合作和货币融合, 积极推动人民币在自由贸易区自由兑换, 把目前人民币在东盟各成员国“民间的”、“非正式的”流通尽快提升到货币政策及正式金融层面的融通, 使人民币与东盟货币区尽早融合, 促使人民币由区域化逐步走向国际化。和平崛起, 经济铺路。马哈蒂尔和吴作栋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友好的“大象”,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中国负责任的经济政策使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国家和地区得到更多实惠。经济铺路既是和平崛起的特征也是和平崛起的内涵。借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货币融合, 参与亚洲货币基金的设立, 主导区域货币亚元的构建, 这有利于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与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一致并相互促进。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内容及现实背景

(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概念与框架构想

作者简介: 乔小明(1971年—), 男, 汉, 上海市人, 管理学博士,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战略管理学。

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概念。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在区位论与发展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发展而来的。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经济一体化理论方面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瓦伊纳(J. Viner),1950 年他在《关税同盟问题》中提出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指出建立关税同盟是有利的,反之就不行。一般说来,本国国内生产成本与成员国的差异越大而成员国与非成员方的成本差异越小,贸易创造效应就越有可能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建立关税同盟就越有利。<sup>[1]</sup>随后,许多学者对经济一体化理论做出了相应发展,英国学者罗布森进一步把关税理论运用于自由贸易区,提出了专门的自由贸易区理论。罗布森从单一国家和两个国家的角度都推导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有利性。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是对外贸易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除了关税同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还包括大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国家需要理论。

大市场理论。西托夫斯基和德纽提出了“大市场理论”,大市场理论是论证共同市场的动态理论。主要观点是:由于各国之间推行狭隘的贸易保护政策,使得国内只能提供狭窄的市场,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大批量生产的利益。建立共同市场能把那些分散孤立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成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部的竞争,实现大批量生产及规模经济等诸多利益。

成员国协议性分工原理。日本教授小岛清在考察了经济共同体内分工的理论基础后,在其著作《对外贸易》中提出了在共同体内实行协议性分工的新理论。他认为,光靠作为竞争原理的比较优势原理不可能完全实现规模经济的好处,书中从成本长期递减来探寻国际分工的动因,认为: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市场来实现规模经济,从而达到成本长期递减的目的;共同市场必须在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建立,而不能在工业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建立;在发达工业国之间,可以进行协议性分工的商品范围比较广,因而利益也比较大;另外在生活水平和文化等互相接近的地区,容易达成协议,并且容易保证相互需求的均等增长。

国家需要理论。该理论认为:第一,在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都要捍卫或增进本国的经济利益。这种愿望和追求可以概括为三种经济需要:经济安全需要(最低层次)、经济实力和竞争力需要(较高层次)、经济霸权需要(最高层次)。<sup>[2]</sup>第二,一国通过经济一体化可以更好地实现和满足自身的经济需要。因此,该理论认为:经济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是经济安全、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经济霸权等三个层次的经济需要;如果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增强了各国的经济需要或提高了它们经济需要的层次,经济一体化就会走向高潮,否则就会走向低落;经济一体化形成后能否巩固和发展,取决于成员国经济需要的层次和经济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

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出于双方加强睦邻合作的政治意愿,更是出于双方经济联系不断深入以及对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回应。按照设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自由开放型的贸易一体化组织,但今后的发展趋势,将促使该自由贸易区走向以契约为维持的紧密型的机制化发展方向。该自由贸易区从逐步取消关税和进行汇率协调开始,进一步过渡到共同市场,使各种劳动要素、服务要素、资本要素以及其它经济要素能够在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签订于 2002 年 11 月的《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于 2003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双方同意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前,

最迟在 2004 年初前开始下调农产品关税,三年内取消其关税,从 2003 年正式举行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谈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的最后期限是 2010 年前后。2004 年底,中国商务部长与东盟 10 国经贸部长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决定从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双方按照商定的时间表全面启动降税进程。协议规定:中国和东盟老 6 国成员将在 2010 年前把大多数正常产品关税降为零,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盟新 4 成员国则可以在 2015 年前将大多数正常关税降为零。在服务业方面,逐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最终实现双方服务业市场的进一步融合,提高投资的保护程度,为双方企业的投资创造一个更为良好、完善的投资环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提出以来,以农业、信息通信、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与湄公河流域开发等五大领域为重点,双方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所形成的的是一个拥有 18 亿人口,区内生产总值近 2 万亿美元,对外贸易额 1.7 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达成东亚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经阶段。

2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构想。(1)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具体来说, A、相互提供颁布的法律、法规、产品标准、卫生防疫措施的信息。B、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实行年度的贸易政策对话制度。包括政府代表团与民间代表团开展经济互访,双边或多边协商举办商品交易会、博览会、投资与贸易推介会,驻外使领馆充当商务媒介等。C、取消非关税壁垒降低并最终取消关税,逐步要求成员国取消相互间的进出口及投资限制。包括海关手续简化,便利双方产品进入对方市场;国营贸易企业事关任何一方利益的进口产品的贸易权利自由化;建立商务人员的流动便利护照制度以推动商务人员的流动性。D、缔结投资协议,避免双重税收协议以促进和保护投资。E、服务贸易确定推动服务贸易的领域,比如旅游、教育、咨询、管理技术、医疗和建筑等。F、有关地方政府与中央部门努力通过双边多边磋商或单边努力,改善交通条件,谋求物流成本的降低。有关共建泛亚铁路、疏通湄公河航道、跨国高速公路、越南将窄轨铁路改成宽轨铁路,都是出于这一目的。面向东盟开放的前沿地带广西、云南、广东、海南加强沿海港口建设、发展走向东盟的高等级公路,提议修建跨国铁路,也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2) 市场基础建设和技术援助提高东盟成员,特别是新成员们的市场硬件建设,拓展他们与中国的贸易。(3) 将双方的经贸合作扩大到金融、旅游、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小企业、产业合作、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林业及能源、高纤维素饮食、次区域发展等领域。(4) 继续推进现有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将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合适的双方合作组织机制,以便具体执行上述(1) — (3) 中列出的工作框架。

以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将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将来双方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指明方向。并为东亚今后的稳定发展建立巩固的基础。

(二)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系

21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了复兴。世界贸易组织 1995 年成立时,除日本及香港以外,几乎所有 WTO 成员均是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全球经济一体化搞了数十年,到今天实际上只出现了几个区域性经合组织,究其原因,有三个方

本比较小。欧盟的成功起到了示范作用，鼓励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二是美国对区域一体化态度的转变，从以前以多边方式回应欧洲的区域行动变成以区域方式回应欧洲。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是进行竞争的。竞争的结果是谁把亚洲拉到自己的阵营当中，哪一方的权重就比较大，所以美国愿意加入到“APEC”机制里来，就是为了对抗欧洲方兴未艾的区域纵深性合作和扩大性合作的一种抗衡行为；三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改变，使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有了长足的发展。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大概有180多个，在亚洲就不少于15个，东盟的成立就是其中的范例。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区域性贸易组织仍然蓬勃发展有力地说明了区域化和全球化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多数学者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只是向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过渡的中间阶段或必经阶段。由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当前主要集中在基于地缘的国家或地区，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使得区域化成为当代全球化的一种表现与局部替代。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全球化的目标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性，民族国家既期望在全球化中分获利益，又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经济中通过区域组织的力量来保护和改善自己的地位。建立区域组织是各国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理智选择。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纳入WTO规则的框架体系之下，使其尽可能朝与多边自由贸易相一致的方向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中国在WTO中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关系。从法律上看，乌拉圭回合对区域经济协定有三个重要的结果：一是采取了“1994年GATT第24条解释的理解”试图澄清在第24条下通报WTO的评估标准和程序以及改进所有协定的透明度。二是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其中的第5条在有关服务业上等价于GATT的第24条。三是1996年成立了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主要职能是评估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是否符合GATT和服务贸易总协定；<sup>[3]</sup>从授权方面看，GATT第24条第5款允许成员设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在区域内实行更为优惠的关税措施；服务贸易协定第5条第1款允许成员订立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服务贸易协定第5条和GATT第24条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在不提高贸易壁垒总体水平的前提下，便利协定参加方之间的贸易，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区别只在于，由于服务贸易协定不涉及关税和数量限制等贸易壁垒，所以没有使用关税同盟这一称谓；从限制方面看，GATT与服务贸易协定有一些约束性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能降低区域外成员国的待遇，也就是说对区域外成员国征收的关税或施加的条件不能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前更高或更严格。这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同WTO多边体系共存的基础，是确保区域一体化不致对WTO多边体系构成障碍乃至威胁的关键。这些条款和限制都旨在确保区域经济一体化在WTO多边框架内发展。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必须遵守WTO的一般原则和规则，但在市场准入方面，双方相互给予的待遇，可以比双方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给予其他WTO成员的条件更加优惠。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在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同时，努力加强与周边邻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与WTO倡导的贸易自由化宗旨和目标相一致。同时，它在市场开放程度上比WTO更进一步，这就为双方扩大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挖掘发展潜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广阔的空间。中国

与东盟将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共同迎接挑战，为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 (三)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并非容易之事，在组建的过程中必将遇到重重难题：

1. 主导权的问题。主导权或者说是领导权的问题，将始终是该自由贸易区会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东盟国家中，它们中的任何一国经济实力都比不上中国，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即将形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势必要与中国较量一番。在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中国每年都推出一系列让东盟无可挑剔的措施和建议，使其感觉一直是被中国牵着鼻子走。此外，东盟部份成员国担心中国利用经济上的优势以及在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的让利对东盟施加更大的影响。

2. 合作目标与要求不一致问题。东盟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初衷是搭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顺风车，缓解中国加入WTO以后与东盟在吸引外资和争夺出口市场方面形成竞争的压力，但实际情况并没有朝东盟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美国、日本和欧盟仍是中国与东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导致东盟部分国家没有从战略上重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仍忙于与其他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对东盟的经贸援助，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内容较为有限。APEC的实践已经证实，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发展援助这两个轮子的关系解决不好，会关系到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今后的发展方向，严重的甚至会使得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发生逆转，此外，由于所获利益分配不均，东盟部分成员对自由贸易区的热情有所降低，如东盟对中国的顺差基本上被6个老成员国瓜分，4个新成员国对中国仍长期存在逆差。

3. 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在中国与东盟国家间关于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问题基本得到控制和解决的情况下，从长远看，包括毒品、非法移民、资源和环境安全、恐怖主义、洗钱和金融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构成严重挑战，成为影响区域和平及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

分析出存在的问题，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开端，中国和东盟已就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原则、目标领域、时间框架达成了共识，因此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一如既往地按原定计划向前推进。

###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比较优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优于“APEC”机制，更富有活力。这除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身的优势外，根本原因还是“APEC”机制先天缺陷造成的。同时，由于日本、韩国格局的局限性，中国——东盟组合也比东盟——日本、韩国组合更具有优越性。

#### (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自身优势

现在东盟在构建的是三个“十加一”机制，东盟加韩国、东盟加日本、东盟加中国。其中中国加东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机制。理由是：第一，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同，发展阶段大致相同就不会出现一些我们今天还没有揭示出来的政治原因和其他各种要素流动、资源配置方面带来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潜在的制度性成本相对比东盟与韩国、东盟与日本要小得多。第二，中国属于大陆性经济，东盟属于海洋性经济，这两种不同属性的经济其贸易潜力互补的成份比较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世界是在同纬度间进行贸易。到了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时候，不同纬度间贸易的潜力由于

过去五十年的同纬度间贸易的潜力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而逐渐显现出强大的能量,中国大陆和东盟,纬度确有差异,且地缘接壤,所以贸易潜力比较大。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自身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化交流的优势。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是由于文化的相似性、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地理上的临近,形成了新的一体化模式。文化的交流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非物质或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一个融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旅游、人力资源、产业合作等为一体的宽泛的哲学范畴,是人类共同财富。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能促进和带动经贸领域的合作与发展,能促进一个睦邻、互信、协商的中国东盟大家庭的共同繁荣与进步。可以说中国——东盟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正式文化交流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汉代从广东沿海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联系。明朝郑和下西洋的事迹至今仍在东南亚各国的民众中广为流传,还出现了“郑和崇拜”的文化现象,与郑和有关的文献、习俗、文物、民间传说甚至神话已经成为东南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近代,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1)文学语言方面。泰国作家曾将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译成泰文,并由此而创造了泰国文学中的一种新文体“三国文体”,这种文体对泰国文学有重大影响;越南一些小说家将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一些主要情节和重要创意翻译成越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创作,写出了一些越南武侠小说;马来西亚曾把十多部中国小说翻译成马来文;老挝作家伦沙万的小说《生活的道路》被译成中文;东盟各国由于受当地华侨华人的影响,广泛使用汉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中就吸收了相当多的汉语借词。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掌握语言既能了解对方,也能为促进双方的文化交流打基础。(2)文化艺术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艺术交流不断发展。这些互访包含了艺术交流、商业性演出及参加对方的文化艺术节等。体育方面越南、缅甸、老挝的运动员经常到云南、广西接受培训或参加比赛。东南亚国家的艺术作品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等等。(3)科技与教育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教育领域方面也有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双方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一些校长曾多次互访。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发展,目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学习对方语言的学生人数都大大增加。中国有多所大学开设了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培养将来能到东南亚国家担任中文教师的人才。中国还与东南亚开展了合作办学,有十所大学获准到东南亚各国开设孔子学院以传播中华文化。(4)旅游方面。由于欣赏异国文化是旅游的主要内容之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双方的文化沟通和交流。近年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出国互访旅游的人数都呈现出飞跃发展的趋势。东南亚还有大批不同时代移居过去的华侨华人,他们到了东南亚后,也将中国文化带到了居住国,客观上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现阶段有关中国政府与东盟成员国政府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彼此之间文化交流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潜力巨大。<sup>[4]</sup>

2 华人商业网络优势。华人商业网络是基于血缘种族关系而形成的国际商业系统,它主要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东南亚,它肇始于 17 世纪,形成于 19 世纪,发展于二战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巨大的市场以及对海外投资的优惠政策使华人投资开始回归“故土”,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华人

商业网络进一步拓展。亚洲金融危机后与韩国和东盟的受灾程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借助牢固的华人商业网,在金融危机中受损程度明显较小。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以中国为主导的华人商业网相对于日本、韩国为主导的次区域经济圈有以下优势:(1)弹性强。日韩大型企业富有规模效率,而华人企业却具有创新效率,能不断地在产品上推陈出新。此外,日本引领的东亚生产网络产业成长层次性鲜明,而华人商业网则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更高的灵活性。私人华企比较独立,不附属于某个成长链,对市场需求反应迅速。(2)开放性。华人中小企业有很强的竞争力,不仅与日本等其它亚洲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与欧美等西方企业也交往甚密。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地区的国际投资和国际市场机会吸引了美国、西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跨国企业进驻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华商凭借其经验积累和社会网络优势,成为这些跨国公司在当地寻求合作的主要伙伴。这与韩国和东盟严重依赖于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形成鲜明对比。(3)日、韩生产网络是典型的生产驱动型,而华人网络消费主导色彩更明显。

3 “C—P—C 通道”经济。这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势之一,与日本、韩国的组合相比较,中国与东盟的组合具有更现实可靠的措施和制度性安排。“C—P—C 通道”经济包括 CEPA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贸易关系的安排)、PECO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 CAFTA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三大具有战略意义高度的政策体系。已经形成了连接南部中国和整个东盟的经济大动脉,这是区域经贸一体化的崭新格局,并且这一经济现象越来越引人注目,经济效果越来越明显清晰,战略意义越来越不可忽略。“C—P—C 通道”经济的形成体现了更为深刻的宏观背景和战略意图。

“C—P—C 通道”经济凸显了流量经济的整体效应。通道经济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流量经济,当代经济中资源和要素的不断流动支撑了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高速发展,并且这些资源和要素的流动性越强、规模性越大、协调性越强产生的经济效果和倍数效应就越好。CEPA 的出台,进一步加强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巩固了香港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中心的作用,CEPA 从 2006 年开始进入实施的第三阶段。根据商务部统计,CEPA 实施 3 年来,截止 2006 年 3 月底,赴港澳“个人游”已达 1227 万人次,为香港带来 600 多亿港元的收入。截止 2006 年一季度内地累计进口享受零关税待遇的港澳货物总值 4.94 亿美元,税款优惠额达 3.02 亿元人民币;目前香港银行业已经在内地开设了 50 家分行、28 家支行;三年来,香港企业对内地直接投资累计 546 亿美元,而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达到 217 家,市值高达 3700 亿港元。PECO 计划,是由广东省委、省政府倡议,并得到了 8 个省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积极响应,目前该计划正在顺利推进中。其范围包括了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 9 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 9+2”。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PECO 配合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和 CEPA 的实施使港澳与内地的经济和文化更加融合为一体,为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实施“9+2”在其运作机制和政策框架方面与“10+1”进行对接,逐步纳入“10+1”的总体合作框架中,成为实现“10+1”合作的前沿地带,成为推进合作的主体之一。由于泛珠江三角洲的各省以及港澳与东南亚各国有着水路和陆路接壤的地理优势,且港澳与国际经济联系

十分紧密,将持续不断的接受国际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辐射。推动“9+2”区域合作可以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发挥主要桥梁和纽带作用。

“C—P—C通道”经济体现十分清晰的战略价值。将CEPA、PECO和CAFTA连接起来,目的就是要形成泛珠——东盟经济一体态势,促成东盟向中国靠拢,达到国家政治取向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双重效果。这一制度安排,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单纯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促使双方形成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CPC通道”经济蕴藏的战略价值就在于,中国与东盟、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份,通过经济一体化来遏制政治的单一化和军事的强权化,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的多极化来赢得世界性的和平与发展,并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4 经济相互依存。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sup>①</sup>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在经济学中,经济行为一般都是由个体利益所驱动,对个体与他人互动过程的研究也是以非合作分析为基础,合作行为的存在常通过个体利益最大化加以解释。换言之,根本不存在无条件的合作。<sup>[5]</sup>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

中国和东盟国家由于彼此国界紧紧相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双方国家间经济贸易联系日趋加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双方贸易发展大大加快,双方贸易额呈直线上升趋势,2001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共达416.14亿美元。在东盟国家中,与中国贸易额最多的国家分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但文莱与中国双边贸易额增长得最快,2000年高达80%以上。再从中国吸引东盟国家的外资看,2000年中国从东盟总共吸引外资达30.15亿美元,其中,中国从新加坡吸引的外资就达20.4亿美元。随着双方今后经贸交往的逐步扩大,中国从东盟吸引的外资将会稳步增强。中国和东盟经贸关系之所以能进入全面合作状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1)经济上的互补性。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主要领域是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相互投资、区域开发和科技合作等方面。近10年来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即从初级产品为主,逐步过渡到以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出口产品为主。这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口产品之间的互补性增加。从总体上看,东盟国家科技水平偏低,已经成为制约科技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但有完整的基础技术部门和大量正在开发的中间技术,而且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也有相当的基础。这就使同中国处在同一发展阶段、有不同技

术优势的东盟各国可以与我国进行广泛的技术合作和技术贸易。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份是东盟具有优势的产品,这些产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份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性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但由于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零配件,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这充分说明中国信息产业凭借自己的规模优势把东盟各国的相关产业纳入了自己的生产链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该产业的国际分工协作。(2)中国市场的巨大容量。中国市场对东盟国家的巨大吸引力可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东盟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可以反映前者对后者市场的依赖度。仅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变动中,便可看出前者对后者的依存度在逐步增加。在此期间除新加坡外贸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有所下降外,其余东盟国家的外贸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情况都有不同程度地增长,其中,对中国市场依存程度增加最多的是印尼,增加了0.93个百分点,增长幅度最小的是泰国,为0.25个百分点。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的增强,表明东盟国家愿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增强。其次是东盟各国认识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希望尽快打入中国市场。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日本和欧盟经济相继陷入衰退困境,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实施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措施对东盟国家的经济以致命打击,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慢。与此相反,中国的经济在这一时期还在继续增长,让东盟国家看到了经济复苏的希望,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内在潜能释放出来,其世界工厂的市场地位,对急于摆脱困境的东盟国家来说无疑是看到了光明未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3)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随着两极体制解体和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加强,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为对抗美国把北美自由贸易区逐步扩展到全美洲乃至亚洲的企图,为了在现在和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中国与东盟及时调整对外政策,高度重视彼此的友好关系,尽快建立起区域组织,从而为今后在与北美自由贸易组织和欧盟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中建立起相应的谈判地位。

#### (二)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缺陷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APEC”是一个跨洲,跨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合作组织,它是市场为动力的松散性区域化组织,区别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以契约来维持的机构性的区域化组织。在这两种经贸合作组织形式中,多数人认为若从国家的贸易投资联系紧密程度进行考察,则邻近国家已经组成或即将形成的贸易组织这种合作方式,要比越洋跨海结成的经济贸易组织形式,其成员从贸易投资自由化中获得的实惠要多得多。在这方面,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是最好的案例,这两个

① 雁行模式中,领头的是日本,四大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紧随,东盟四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在后。但东亚各国(地区)经济的发展现实使该模式遭到过质疑,也有人指出东亚经济合作遵循的是其它模式。

经合组织都是由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通过贸易投资和诸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紧密合作方式给成员间带来更多的经济实惠, APEC 其组织成员进行松散合作可以, 而密切合作难度就比较大, 因为成员国不处在同一个区域内自然缺乏更多密切相关的利益。APEC 是把美洲区和亚洲区通过太平洋这个中间水路连接起来, 它的区域利益是有冲突的, 从现实角度看要把不同区域国家整合成一个经贸合作组织难度比在单个区域内进行要大很多。

亚太经贸合作组织内部各成员经贸体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因此实践中, 不仅在某一时期的某些问题上, 相互之间的意志与利益取向并非一致, 而且鉴于经合组织内各成员在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 经合组织的利益往往还会倾向于组织内部那些实力较强的成员的国家利益与意志。如此运作的结果, 势必使经合组织的发展受到组织内部强势成员的影响甚至左右。在 APEC 的 42 个成员国里面, 美国是最高度发达的国家, 但在 APEC 的其它成员国中, 在太平洋这个区域里, 能够找到经贸水平相当低的国家, 他们彼此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不同经贸发展阶段的国家, 存在着利益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差异, 比如, 美国需要环太平洋沿岸的国家成为其商品的倾销国, 需要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来维持自身高速运转的经济。而发展中国家需要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输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资源配置方面和流动方面, 不同发展经济阶段的国家, 相互间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 或者说是交易成本非常高。所以 APEC 这样一种跨洲、跨经济发展阶段的经合组织, 进行松散性合作可以, 进行密切合作难度就比较大, 这是它的先天性缺陷造成的。在现阶段, 作为利己的经济人以及出于“搭便车”之目的, APEC 中许多成员经济体往往倾向于最大限度地等待其它成员的妥协。因此, 美国、日本等发达成员国对 APEC 的态度已不像当初那样热情了, 最终的结果 APEC 不仅会与其预期中的目标相去甚远, 而且其应有的影响力和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 (三) 东盟与日本、韩国组合的局限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 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当然要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即必须具有地缘邻近、经济优势互补和相当的经济规模。东盟与日本、韩国组建自由贸易区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是有所欠缺的, 因而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相比其局限性显而易见。

1. 东盟与日本组合的局限性。首先, 从经济状况基本分析, 日本在 90 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 经济长期低迷, 经济总量虽然仍很大, 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 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 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 日本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 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 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 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 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金融危机过后, 东盟经济恢复迟缓, 对日本的援助有着很高的期待, 欢迎日本扩大对东盟经济的参与。然而日本不是像以往的本首相那样搞“支票外交”, 而是向东盟国家解释政府对外开发援助要大幅削减, 这令东盟国家颇感沮丧。其次, 日本对国内农产品的保护政策将限制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长期以来, 日本对本国农产品实行保护政策, 农产品贸易问题是日本对外贸易摩擦的主要领域, 农民是执政的自民党的主要支持者, 因此农产品问题难以解决。2002 年初日本小泉首相访问了东盟 5 国, 唯一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协

议的只有新加坡, 日方坦言因为和新加坡之间没有农产品贸易问题。东盟其它国家希望向日本出口农业产品, 日方极力回避作出明确答复。日本能否同东盟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关键在于能否开放视为禁区的农业领域, 这涉及日本产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 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第三, 日本对是否完全融入亚洲犹豫不定, 企图在“亚洲主义”和“协调主义”之间保持平衡, 使其难以以全力推动地区合作向前发展。一方面日本经贸在很大程度上更依赖与美欧的关系, 在亚洲和美欧之间摇摆不定。另一方面, 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期间, 中国的经济却保持长期高速增长, 使日本感到震惊, 对中国吸引外资特别是吸引日本企业投资可能造成自身产业“空心化”深感不安。德国在上海磁悬浮列车项目上积极向中方转移核心技术所带来的利益, 已经说明日本以本土市场为中心的梯次产品转移战略在中国市场失败, 已经警示日本在亚洲领头雁位置受到了挑战与威胁。<sup>[6]</sup>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 日本不得不把一部份精力放回到亚洲来, 通过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保住亚洲的领头地位, 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这两方面的原因反映出日本在处理同欧美和同亚洲的关系时处于“一种内心和身体分家的状态”, 日本看来难以摆脱这种两难处境。

2. 东盟与韩国组合的局限性。在中日相继确定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后, 2003 年 10 月韩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双方领导人同意加强对双方经济关系进行研究, 韩国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2004 年 9 月在印尼召开的“10+3”经济部长会议上, 东盟建议 2005 年开始与韩国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 争取 2007 年达成一致, 2009 年对非敏感商品完全取消关税。韩国则表示认真考虑东盟的建议。各项谈判事宜虽然都在顺序进行, 但东盟与韩国组合的局限性较之日本更为突出。首先, 韩国的国土面积狭小, 大致相当于我国三至四个延边地区大小, 这样一个国家与东盟组合在国际上很难有较大影响力。韩国本身市场狭小, 东盟所需要的市场、技术可以从中国、日本获取。从双方经贸关系分析中可以看到, 东盟与韩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比较脆弱, 各自对其它市场的依赖性明显要超过对方。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日本、欧盟、中国, 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日本、中国。东盟对韩国的贸易额明显低于日本和中国; 韩国对东盟的投资比重也较低, 1995 年—2001 年, 韩国资本仅占东盟吸引外资总额的 1.6%, 而日本占 15.4%。第二, 韩国提出与东盟组建自由贸易区是出于被动, 而非自觉自愿。韩国存在着较大的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主要源于中国、日本及其它经济体。目前韩国资本大部份投向中国, 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及 2002 年中国率先与东盟确定建立自由贸易区, 使韩国感到了竞争的压力。从 2004 年 7 月 20 日中国与东盟间贸易商品关税阶段性下调为起点, CAFTA 协定已正式开始实施, 这对韩国商品的出口极为不利。根据 CAFTA 协定, 中国与韩国和日本存在竞争关系的出口商品有望在东盟市场获得免税优惠待遇。机械和电子器材是目前东盟市场上中、日、韩存在竞争关系的商品, 相对于享受无关税待遇的中国, 韩国将明显处于不利地位。预计在马来西亚的汽车零部件、印尼的挖掘机等建筑机械、泰国的音响器材、家用传热器材、空气净化器、电风扇等领域, 韩国产品的竞争力将明显降低。韩国产品比日本产品受到的冲击将更大, 因为中国和韩国产品的竞争相比日本更为激烈。日本紧接着中国之后向东盟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 韩国如果不加快与东盟的合作步伐, 就有被边缘化的危机。根据韩国专家的计算, 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 韩国 GDP 会降低

0.18%，如果日本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韩国 GDP 会降低 0.20%。东亚区域合作是发展的趋势，韩国清楚自己已经处于落后的地位，在形势的逼迫下只得加快与东盟的谈判。非主动自觉情形下进行的谈判，其谈判条件的准备，协议签订的合理性及各项相关细则实施都令人置疑。同时，韩国与日本一样，在对待东亚合作问题上，非常介意美国的态度，在美国的影响下，韩国对东亚合作的态度并不明朗。

###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借鉴与模式选择

在当今世界，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中取得巨大成就的范例。这两个区域经济组织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分别高达 26.9% 和 20.3%，占世界 GDP 的比重分别为 30.1% 和 10.24%，<sup>[7]</sup> 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大区域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及其作用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其它区域经济组织，特别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模式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 (一) 欧洲联盟

欧盟的一体化具有渐进性，从最简单、最特别的领域发展到全面、整体和复杂的领域。根据《罗马条约》欧盟成立于 1958 年 1 月 1 日，当初的名字是欧洲经济共同体；1967 年 7 月 1 日起领导机构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改称欧共体；1993 年 11 月 1 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改称欧洲联盟。在欧盟发展的近 50 年时间里，其成员国从最初的 6 国扩大到现在的 25 个国家，在此期间，经济一体化合作实现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关税同盟，1968 年建立了关税同盟；第二次是统一大市场（1993 年的共同市场）；第三次是经济与货币联盟（1999 年）。欧盟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动态的整合过程，从 1957 年到 2006 年经过近 49 年的努力，欧盟以区域经济为龙头，通过各成员国的相互合作，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关税同盟到共同的农业政策、从欧洲货币合作到统一大市场和欧元的正式流通，欧洲经济一体化逐步完成了由经济一体化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发展过程。欧盟具有明显的超国家特性，是制度化、机制化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模式。欧盟模式的特点是：

第一，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且相互接近，一体化的基础不是要素禀赋的差异，而是相近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差异，这有助于各国进行同类产品的生产分工和开展产业内贸易，有利于各国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欧盟各成员国对同盟内部市场的依赖性较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造成各成员国普遍具有较高的内需，而通过一体化形成更大规模的市场对各成员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这是欧盟从低层次的自由贸易区向经济货币联盟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和动力；此外，各成员国的政策、文化等也相近，使得一体化模式的协调方式较容易达成共识。欧盟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后发行欧元，向着货币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第二，欧盟具有较为严密的法律体系，以一套完整的超国家组织、管理机构来进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协调。主要机构有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欧洲法院、欧洲审计院等。这一套机构可以协调区域内经济的发展，保证了欧盟决议的顺利执行。此外，还组建区内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欧元，确保了欧盟区域经济的持续飞速发展。

第三，各种协调成就的获得是通过实施阶段性政策的结果。欧盟各种成就的获得是有步骤、有阶段的实施结果。比如欧盟工业品关税同盟的建立，就是在《罗马

条约》中规定了逐步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的时间表。

#### (二) 北美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根据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3 国于 1992 年 12 月 17 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建并于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的区域经济贸易组织，该区域组织的经济规模与欧盟相当，拥有 3.8 亿人口，近 8.62 万亿美元的总 GDP（1997 年）。其宗旨是：取消贸易壁垒，制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增加投资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建立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促进三边和多边合作。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世界上第一个出现的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其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资源禀赋也不一样。该自由贸易区突破了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域间的垂直分工，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的国家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区域经济合作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墨西哥与美、加的经贸差距，美、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份传统产业向墨西哥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也给墨西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技术份量相对而言较高的资本重组也提高了墨西哥的资本有机构成和效率。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区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成员国有效抵御经济风险，缓解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其它矛盾。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是较单纯的共同市场，贸易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限于经贸往来，给予和享受特殊优惠待遇以及贸易纠纷的协调解决。<sup>[8]</sup> 对于希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而言，美国的共同市场模式可能更具参考价值。北美自由贸易区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有自己的两项创新：1. 它在一般自由贸易区实现商品自由流通的目标之外，增加了劳务合作的目标和促进相互投资的目标。2. 照顾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墨西哥的利益，实行有差别的消除贸易壁垒安排。

第二，北美自由贸易区合作的基础不是双方的经济水平，而是源于密切经济联系与经济互补。区内的三国在能源、劳动力、资本、农产品等方面有着很强的互补关系，墨西哥和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而美国是世界上的能源消费第一大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石油；墨西哥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与拥有先进技术设备和雄厚资本的美国形成优势互补；美、墨两国的农业生产本来就各具特色，加之墨西哥要进口大量的肉制品、奶制品和粮食，与美国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有极大的合作空间；加拿大的能源技术和畜产品，在墨西哥很有市场。

第三，实行有差别的消除贸易壁垒的安排。南北共存性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决定了发展中的成员国势必承担较大的“调整成本”，要求发达成员国向发展中成员国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倾斜”和“照顾”，这样能保证“互惠互利”的原则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是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对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实行了“差别”待遇。协定规定在 15 年内分三个阶段取消进口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但由于墨西哥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该模式采取了阶段性的消除贸易壁垒规定。比如协定中规定在第一阶段，墨西哥只对来自美国 35% 的商品取消关税，对来自加拿大的 5% 的商品取消关税，而美国和加拿大对来自墨西哥的 80% 的商品免税。

上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调发展及模式选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意义：

1. 区域内经济发展必须有核心国家，这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欧盟形成了以德法为经济发展的核

心,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了以美国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从而带动整个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样,虽然区域内有比较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和文莱,其GDP较高,基本属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但由于这两国的国内市场狭小,并不能带动整个区内经济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而且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市场有着广阔空间,在整个东亚经济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东盟与中国有着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在自由贸易区内应以中国为核心,加强紧密合作,来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和对外经济的过分依赖问题。

2 区域对外贸易协调应采取渐进方式。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区域经济组织由高到低大致有以下5种类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综观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协调模式,都是渐进发展的,从欧盟的发展历程看,无论是工业品关税同盟的建立,还是欧元的正式流通,都有一个时间表在调控进度。

3 建立超国家的高效组织机构和争端解决机构来保证制度化的紧密合作。各成员国都按照统一的制度性安排对国内经济结构进行能动的调整,使之符合“趋同”标准,因而能够实行普遍的无歧视的国民待遇原则,这是自由贸易区能够得以存在并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像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一样,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和下设若干机构,通过这些机构各司其职,并制定有关条约来规定各机构的职能和管辖范围,规范区域内贸易发展和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解决经济合作中可能出现的纠纷问题。

4 加强金融合作。在各成员国实现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加强彼此间的金融合作,增强各国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加强了金融监管,但要想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就必须建立区域内的金融合作机制,最终成立亚洲货币合作体系是最理想的选择。

#### 四、建立亚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02年底正式启动,2005年7月“货物贸易协议”实施,双方7000余种商品开始全面降税,贸易额持续增长。2006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6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4%,体现了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双方贸易的积极促进作用。2007年1月前外长李肇星和东盟10个成员国负责经贸事务的部长在宿务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东盟将分别在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向中国做出市场开放承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行得有条不紊,反观货币领域,则无所作为。货币合作落后于贸易投资的合作,将不利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也将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延缓。亚洲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亚洲国家加强货币合作,建立一张金融安全网,以应付国际投机资本急流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经济全球化要求货币全球化。货币区域化是货币全球化的必经阶段。正是从这个角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和蒙代尔先后在1998年和2003

年,提出组建区域货币亚元的主张。在2005年4月23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再次提到了在亚洲实行亚元货币的问题。曾荫权指出,统一货币可以帮助亚洲的统一或者能够成为亚洲实现统一的工具。亚元如果能实现流通,那么“亚元区”内成员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高,从而扩大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促进经济的发展。研究表明,统一货币可以使亚洲区域内贸易额提高300%。所以,亚洲实体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亚洲金融合作愈发紧迫,如果早日实现统一货币,则区域内贸易量越大,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越多。从现实的贸易往来情况看,东亚各国间的贸易密切度还比不上欧盟,但各国间均已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并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亚洲区域实体经济的一体化在增大金融合作需求的同时,也为实现亚元正式流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货币体系基础架构的货币联盟演进路径目前主要有单一货币联盟、多重货币联盟以及主导货币区化三种形式。单一货币联盟具有透明性,节省信息和交易成本的优势,欧元即属此类。欧盟组织里各成员国的权重相差并不是太大,虽然德国和法国的经济权重比较大一点,但这两国间的个头大致相当,所以欧盟需要一个统一货币。北美货币联盟属主导货币区域化类型,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美国的货币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加拿大和墨西哥完全没有谈判的力量与美国抗衡,区域内的货物和服务贸易都是以美元结算,所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货币就是美元。在东亚加中国大陆这个机制里,有了自由贸易区以后,而没有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地位的货币时,建立统一货币,恰好具有它的制度性优势。

#### (一) 建立亚元的必要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制度走上漫长的改革路程。现行货币体系沿袭了50多年前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秩序和纪律,诸多矛盾也凸显出来,例如国际货币体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与金融全球化的现实越来越不相称、汇率制度安排与金融全球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和金融全球化使MF的职能发生异化等。<sup>[9]</sup>习惯上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往往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F)。但是,在危机的发展过程中,MF的表现使东亚国家大失所望。MF的援助常常出于保护西方贷款者利益的目的,拘泥于“华盛顿共识”而忽视亚洲地区的具体情况。1998年,蒙代尔指出,今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能完成的任务,只需要由在华尔街上的一个私人性的金融咨询公司就能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统一的中央银行性质的组织。而是一个或几个政府的经济代表。此外,国际货币体系本身存在着不均衡性,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牙买加体系”,<sup>[2]</sup>仅解决了部份发达国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问题;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汇率制度的不均衡程度日益严重。亚洲金融危机的几个主要发生国,都显著的表现为实行钉住美元的单一货币浮动管理汇率制度。

从外因看,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制度安排的缺失,必然产生国际货币合作的需要。创建独立于一国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或区域货币群体是较为

<sup>②</sup> 牙买加协议,1976年1月, MF“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召开会议,就汇率制度、基金问题、扩大基金贷款额度,增加会员国缴纳基金份额等问题达成协议。同年4月, MF理事会通过该协议,牙买加会议所达成的协议称为“牙买加协议”。

可行的途径。近年来,欧元区经济的平稳安全运作,给东亚国家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启示。即没有一种区域性的货币危机解救机制也是使危机扩大的重大原因之一。在东亚各国的积极推动下,东亚货币合作的步伐已开始加快,1999年东盟“10+3”的《东亚合作宣言》以及2002年5月的“清迈倡议”已将东亚货币合作提上了议事日程,亚元实施的可能性加强。从内因看,创立亚元是亚洲自身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亚洲地区要想获得顺利发展,就必须加强地区内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创立区域性货币联盟,也能进一步稳定汇率,消除汇率风险,又能减少流通中的货币交易成本,扩大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规模,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 (二) 建立亚元的理论依据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 Currency Areas)是建立区域货币一体化的主要理论依据,该理论是由有着“欧元之父”头衔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于1961年首先提出的,他在1961年9月的《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开拓性文章《最优货币区理论》,后经麦金农、凯南等经济学家不断补充而日益完善起来。

所谓最优货币区理论主要是阐述一个最优货币区、货币联盟或者货币一体化应具备的条件及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在这个“最优”的区域内,“通常的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共同放在一个货币篮子里,它们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项目贸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在对区域外的国家时,保持浮动汇率机制”。<sup>[10]</sup>“最优”在此意味着内部平稳与外部平衡同时得以实现。蒙代尔认为在最优货币区内部,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可以使诸生产要素得到有效的利用;而对外运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调节贸易关系,可以平衡国际收支,从而在维护本区域微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稳定了宏观经济。由此可见,蒙代尔更多强调的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因为高度流动的生产要素,它能在区域内出现需求转移或其它“不对称冲击”时,起到抵消这些冲击的“缓动器”作用。要素的流动性是区域内的平衡机制,而弹性汇率则是不同货币区之间的平衡机制。然而欧元正式上市流通表明这一看法存在缺陷。欧盟内部原来的生产要素流动性不高,但欧元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出现,并反而促进了生产要素流动性的提高。随后,英格拉姆(Ingam, 1962)、麦金农(Mckinnon, 1963)和凯南(Kenan, 1969)、弗莱明(Fleming, 1971)等发展了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与贸易产品多元化以及通货膨胀率等标准。Ishiyama(1975)和Tower with Willet(1976)进一步提出从成本—收益综合考虑货币区决策,完善了理论分析框架;Krygman(1990)强调从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综合度量货币区收益与成本,提出了适合进行货币合作的一体化临界状态条件。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二战后金融区域化发展现象在经济理论界的反映。

### (三) 建立亚元的可行性

欧元与美元“二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加大了全球资源非均衡的流动以及金融风险的发生,以美国为代表的核心通货国家在全球收取铸币收益、通货膨胀税以及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已成为世界贸易健康发展的障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国际货币制度框架下很难摆脱被主宰和掠夺的命运。亚洲各国更加明确,要改变目前亚洲各国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境地,要使亚洲经济不再作为大国货币的附

属品,必须改变现存不公平的国际货币制度,加强地区间金融协调与合作,建立自己的货币合作制度——亚元,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制度中的霸权特性,真正实现亚洲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长期来看,把实现单一货币作为东亚货币合作的明确目标,通过区域合作建立东亚货币区是大势所趋,尽管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背景差异较大,整体上目前还无法满足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条件,但部份国家和地区条件较为符合,同时东亚国家和地区是当前世界上贸易发展较快的区域之一,其中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积极筹建,使得建立东亚货币区的有利条件不断增加,并成为亚元合作的良好基础。在这方面,欧元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如果说东亚在一些方面尚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一些标准,那么在筹建欧元时,欧洲同样在某些方面也不完全具备,但欧元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功问世。究其原因在于:组成货币区往往涉及成员国政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单以一个或几个经济因素作为设立标准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同时,设立货币区会使各成员国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这就需要更多的政治方面的合作。欧元的光辉之处就在于它是在主权分立的情况下通过协商实现了货币整合,因此从相当程度上讲,与经济学家们的分析相比,要在实质上推动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政治家们的决心更为关键。在成功的货币同盟内政治因素压倒了经济标准,但这需要起着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存在,它愿意且能够运用其影响来维持货币合作。要构建在东亚区域内流通的单一货币——亚元,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在于中国。

中国将用21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倡导构建亚洲货币一体化就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的科学选择。亚洲货币一体化合作是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集中体现。

在国际组织各种合作机制中,随着中国在拯救亚洲金融危机中以地区责任为己任的大国形象的建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伴随东盟“10+3”机制成为地区共同合作的现实。2003年10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10+3”会议上倡议,“10+3”应深化经济和金融合作,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在“10+3”机制的影响下中日韩三国多边合作也已启动。东盟10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它标志着亚洲经济合作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根据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亚洲国家的货币合作已经出现一些可喜现象。

1、要素市场的流动性。成员国如果具备要素市场灵活、劳动力及资本在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的标准要求,那么这些国家很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所组成货币区既可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国际交易成本,同时还有利于抵抗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亚洲国家目前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的因素很多,其中人员流动限制最为严格。金融危机后这些限制更有所加强,但必将随着亚洲货币一体化合作的深化而减弱。

东盟“10+3”机制的建立将加速东亚各国要素市场的流动性。机制成立的几年里,东亚经济合作取得了较大进展。2000年5月6日东盟与中、日、韩在“清迈倡议”中达成互换货币的协定,东亚地区货币合作事务逐步走向机制化,该协定的宗旨在于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即发生货币危机时,通过互贷外汇,防止汇率发生急剧变动;加强信息交流,以求尽早发现各国宏观经济的缺陷。13国之间在旅游、工业、银行、金融、电信、知识

产权、中小企业、环境、生物技术、林业、能源,以及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方面进行全面洽谈与合作;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建成,届时双方内部大多数商品的关税将降为零。除了湄公河流域的合作开发外双方还将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以及电信、教育、医疗、人力资源等诸多领域进行全面合作。有理由相信随着东亚合作机制的深化健全,区域内部市场要素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会迅速提高。

2 地区开放度与依存度。1963年,麦金农提出以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麦金农认为,在外部条件不变情况下,彼此间贸易联系很密切的国家可以建立单一货币区,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和价格的稳定。经济越开放,区内贸易量越大,共同货币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越大;贸易产品中制成品及类似产品所占的比重越大,贸易伙伴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货币。

东亚国家与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很高,其中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泰国的对外开放度都在100%以上。开放程度高,使得各国或地区的货币对来自外部的冲击十分敏感。因此,迫切需要进行区域内货币合作。中国经济开放度进入新千年以来有了很大改观,其贸易品占商品总量的50%—60%以上,这部分商品价格已由国际市场决定。中国在全球的贸易地位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07年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东盟连续10年成为中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10年来双边贸易增长速度年均增幅达19.1%,2002年更是高达31.7%。中国大陆和“亚洲四小虎”自然资源丰富,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自然资源缺乏,彼此间资源的互补性使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合作走向深化。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建成,预计东盟对中国的出口较2006年将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长55.1%,区域间的开放度将迅速扩大。此外,东亚主要国家的产业结构相近,产品集中程度与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也有利于共同货币的建立。总之,从东亚区域内贸易合作构成和开放程度这个标准来看,近年来区内贸易和投资增长很快,东亚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为组建东亚货币区,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

3 产品和投资多元化程度。麦金农之后,凯南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性作为形成一个最适度通货区的标准。因为产品多样化程度高,意味着出口产品也是多样的,当外国对某些进口品需求发生变化时,对其它产品的进口需求也许会提高很多。产品多样化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更适合实行固定汇率,组成单一的货币联盟,多样化的投资结构对某一部门冲击带来的非系统性风险时,可以通过相应的多样化投资方式消除,如国家持有多样化的外国债权,外部冲击的影响就会减弱。或者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股票和期货的组合投资,适时的投和抛也能起到减弱外部冲击的作用。

在东亚各国与地区内,除中国与日本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其它国家在产业结构上有一定的趋同性。亚洲四小龙中的三个国家与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仿,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策略,并且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相似性,其出口产品大都是电子电器产品、石油产品、纺织品等。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借助地缘相近的优势在自由

贸易区内进行东亚各国的“产品内国际分工”<sup>③</sup>合作。在区域内进行一体化的产业价值链分工合作,能较好的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和分工深化的矛盾。实行产品内国际分工就需要各国的汇率稳定,从而内生出实行单一货币合作的强烈需求。东亚各国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除中国香港的金融国际化程度较高外,其余的都局限于本国范围内。但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深入,中国与东盟各国届时将进行全面的金融合作,放宽政府对金融的管制,积极扩大金融投资品的种类,多样化外汇储备种类。

4 工资价格的弹性。蒙代尔认为,在货币区内为消除一国的超额供给,需要降低实际汇率,实际汇率的降低可以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动实现,如果工资弹性较高,货币区内可以通过调整两国相对价格来实现,因为较高的工资弹性是产品价格弹性较高的基本保障。反之,工资价格是刚性的,经济失衡将持续下去,其结果两国可能会中止货币联盟,使名义汇率变动。

相对于欧盟较高的工资刚性来说,东亚在工资方面具有下述几方面的特征:(1)东亚地区是具有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日本刚刚完成工业化,而另一些国家则正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满足了对城市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2)东亚国家和地区多数不制定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法和雇员税法,工资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市场不发生扭曲。(3)在工资生成的过程中,相比于欧美国家工会的参与程度,东亚国家工会参与程度不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险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4)日本虽然各方面的法规相对较健全,但终身雇佣制也保证了工资的充分弹性,在该制度下,工资水平降低是在市场对劳动力需求减少时降低劳动力成本的一种办法。集合上述特征,东亚国家与地区工资价格的弹性较强,有利于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发展。

此外,由于通货膨胀率是经济项目失衡的主要原因,固定汇率不能在通胀率相差大的情况下长期维持,所以,通胀率趋同是形成共同货币的一个必要条件。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东亚各国的通胀率有趋同的趋势,2003年各国的通胀率方差为7.0,比2002年的16.5降低了一大截,相对于1994—2003年的平均值16.3也低很多,因此,按照“通货膨胀率相似性”的标准,东亚地区实现货币一体化的前景看好。

货币一体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其最高阶段是发行单一货币。实现这一目标,欧盟的建立和欧元的正式流通,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辛历程,欧元的建立也必将经历许多曲折崎岖,不可能一蹴而就。东亚有自身的特定条件和需求,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前景可以在“清迈倡议”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基础上一步步向前迈进,如果东亚各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发展,更重要的是,东亚各国和地区能够互相信任、求同存异、共同努力,愿意付出协调和调整本国经济政策及经济结构的代价,那么东亚货币合作最终走向亚元区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四) 中国应在亚元体系构建中起主导作用

欧元是以德国马克为核心构建的。但亚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使亚洲不能简单复制欧无的成功经验。

<sup>③</sup> 产品内国际分工,这种分工是指参与分工的国家与地区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客观条件在一个产品内部的不同生产阶段和价值链层面上展开的国际分工形态。

最有可能的方式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看谁的货币在亚洲各国中使用最多、占外汇储备比例最大，然后，由领跑者吸纳东亚、东南亚以及西北亚重要国家组成一体化的经济圈和货币联盟，最后统一亚元。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东亚多国遭受重大损失。“亚元”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发的。一般说来，金融危机过后是金融改革的最佳时机，可是，亚元的建设却有颇多阻碍，问题的关键就是日本。日本与中国一直都在暗中争夺亚元的主导权，日本总以为自己应当成为亚元的整合中心。作为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其国际政治地位的稳步上升，日本的影响力逐年下降。日本不甘心主导作用丧失希望通过拉进一些力量和中国相抗衡，以维持影响力，至少使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进程能够延缓一些。但通过客观理性的分析会发现日本主导亚元体系的建设具有先天性缺陷。首先从政治上讲，日本早已脱亚入欧，争取亚元的主导权是希望未来与美国的谈判中增加筹码，改变长期受美国摆布的状况，在亚洲又能保持领导者的角色。因此日本较类似英国，两者同属海洋国家，相比其它内陆国家而言，这样的国家更倾向于在政治上投靠美国，而不愿与区域伙伴联合，而且，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虚伪态度以及诸多领土争端等因素，亚洲邻国对日本怀有极强的戒备心理。其次，从经济上来说日本外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日元难以成为区域内货币的支撑点。外需型模式意味着，日本贸易顺差较大，国际收支长期盈余，日元的境外供应不足。而日本国内市场的规模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调控能力受到限制。日本采取浮动汇率制更符合它的国情，这可以获得资本自由流动与自主的货币政策双重好处。原因在于，一个大国如果对外贸易程度高，自主的货币政策非常重要。稳定作用要求其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维护物价稳定，即把货币钉准一组非贸易商品，以稳定货币的清偿能力或信誉。同时浮动汇率平衡国际收支功能也比小国开放经济体更为有效，从而没有太大的必要使用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来调节国际收支。因此，采用浮动汇率对日本而言更为合理。

一国货币要成为中心货币，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在该区域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占具主导地位；具有较为稳定的汇率。长期以来，美元贸易在亚洲国家贸易中占到总交易量的90%以上，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表明日元将成为亚洲地区的中心货币。从贸易流向看，中国和东亚的大部份国家对日本贸易保持逆差，而对美国保持顺差。这就说明亚洲经济的发动机不在日本而是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加之日元的浮动汇率制，波动过于频繁，决定了日本不能成为亚元体系的主导者。

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GDP超过24万亿人民币，连续五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两位数，现在的GDP总值居世界第四位。对外贸易从21世纪70年代末的世界32位，到90年代跃升为第11位，2007年已经超过德国居于第2位，接纳世界直接投资也仅次于美国居第2位，被誉为“吸金大国”。人民币从2006年开始实行升值策略，预期在今后10年内人民币对美元的比值将升至1美元兑5元人民币。强势的人民币与稳定的港币形成长期并存的格局，对亚洲的发展非常有利。作为身处东亚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东亚地区，而且中国对东亚国家一直保持贸易逆差，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对东亚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中国在未来的亚元体系构建中具备主导亚洲货币合作的能力和基础，也能从亚元合作中获得长远利益。首先，中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时坚持了“不

贬值”的承诺，在亚洲邻邦中建立起良好的形象和威信。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1.53亿美元（截止2007年12月底）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量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份财力参与货币互换机制和组建货币合作基金，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贸易与投资发展和金融稳定的货币框架机制。东亚各国对中国参与领导区域货币合作也抱有较高的期望。其次，如果将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形成看作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那么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就可以看作是迈进的第二步。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潜在市场是巨大的，它可以吸纳愈来愈多的产出，从而形成亚洲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时，就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在华人经济网络的推动下，东盟货币区与人民币货币区的融合，将对亚元体系的构建发挥巨大作用。现今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流通已经享受到“第二美元”的待遇。“2003年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国家（地区）流通总量至少有1510亿元”。<sup>[1]</sup>在越南、老挝、缅甸等边境地区甚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在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已经被普遍作为支付和结算的硬通货，人民币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而官方也公开承认这种自由兑换的合法性。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亚元的主要路径。最后，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决定了中国具有更大的优势，更强的话语权基础。金融危机以后，日本、韩国和东盟各国迫切需要对内调整产业结构，对外加强经济合作。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合作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东盟各国只有在同中国的合作中求得经济的互补、互助。而且，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有助于东亚经济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逐渐转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共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欧美、日等国在中国生产高端技术设备，而从东盟进口的电子和高科技产品又可以作为这些用于出口的高科技制成品的投入品。某些属于劳动密集型和低端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从中国转向劳动力更为便宜的南亚地区。在经济领导分上中国已立于不败之地。

#### （五）亚元形成的关键性阶段

亚元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但在亚洲建立单一货币区对各国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潮流，近期内亚洲各国可以加强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为最终建立亚元奠定基础。分析亚元形成的关键性阶段可以为亚元体系构建提供指导。

1、东亚自由贸易区建立是亚元产生的经济基础。最优货币区从理论变为现实，必需以贸易和投资高度融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础。在东南亚，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05年正式建立；2010年前后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将建成。日本与东盟、韩国与东盟、印度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可能在2010年至2020年间建成，目前日本与印度都已经公布了时间表。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东盟，而中、日、韩是发挥主要推动作用。客观地讲，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有利于东亚合作进程，是加快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有利因素。它将可能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中国和东盟先行在一个大范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把其它国家吸引进来；二是激励其它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步骤加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三是推动整个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建设的步伐，从而激励东亚各国领导人及早对关于建设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做出决定，提出落实规划并开始实施进程，目前这些作

用已开始显现出来。

如果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建成东亚自由贸易区,估计可能会快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于2040年之前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为进行区域性货币合作,建立单一货币亚元带来充分的可行性。

2 亚洲货币基金及亚洲汇率机制的建立是亚元目标的阶段性制度安排。根据欧元的经验,区域性货币合作是形成单一货币的必经阶段。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F)反危机政策的不力和美国的干预,使得亚洲国家危机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出现了恶化的趋势。亚洲各国都认识到,只有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自救机构,才能增加自身经济的独立性,抵御国际游资的冲击。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其职责主要是支持成员国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活动,以促进汇率稳定,管理成员国中央银行间的信贷,逐步集中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并逐步发展为各成员国间的划拨结算中心。现阶段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要内容是巩固和扩大“清迈协议”的成果,加强地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提高对付短期货币流动性问题的集体能力。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将成为增强区域经济安全的现实选择,它可以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并充当区域经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东亚各国在加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与政策协调基础上,可以考虑实现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共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汇率波动幅度必须统一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从现行汇率制度的运行情况看,一些采取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东亚国家,如印尼、韩国、马来西亚等,其货币实际上都是长期钉住美元。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普遍与美元挂钩或以美元作为最重要参考指标的现实,为亚洲汇率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客观基础。该汇率机制一旦建立成功,可以为区域货币提供较为稳定的汇率,并为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外部约束。

3 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中心货币功能的建立是亚元体系构建成功的关键环节。德国马克充当区域内中心货币是欧元体系建设的关键。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大部份是与欧洲其它国家的贸易产生的,德国在欧洲中央银行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欧洲建立货币联盟时,欧洲人很轻易地接受了以德国马克作为范本,以德国自由银行为模式的概念。在亚元体系形成中,中国应以强势国的地位参与货币合作,积极主导其进程,创建亚洲货币基金、亚洲货币单位和亚洲汇率联动机制,逐步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力并使之成为区域内的主导货币,待条件成熟时,使人民币分步骤地完全替代货币区内其它国家(地区)的货币,真正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既需要持续的市场化推动(包括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又需要在确保货币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区域内国家(地区)间的货币合作。政府应主动地、积极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抓紧时机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金融监管部门也应相应的为人民币结算范围的扩

大和规模的增长做好准备。采取签署国家间或省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协议形式与周边国家(地区)或接壤省际间创建自由贸易区和经济圈,在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圈)成员中的贸易投资往来中鼓励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鼓励用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和投融资的支付手段,鼓励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创建亚洲人民币债券市场等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很好的履行这类使命。

4 逐步实现两岸四地货币一体化也是亚元形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中,国际较瞩目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币、港元、澳门元甚至台币之间的关系。一是创建四区统一货币的现实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香港、澳门与中国内地经济一体化已稳步推进,并建立了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尤其是以广东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华南地区经济一体化就是最好的例证;二是港元与人民币都与美元挂钩,澳门元也与港元实行联系汇率制度,三者都以美元做基准,彼此间汇率相当稳定。2001年,高盛亚洲大中华区总经理胡六祖认为,中国入世后,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将逐渐融为一体,未来10年内三地可能出现统一货币,这无疑对东亚地区货币联盟的形成提供基础和有力支持。四区建立统一货币符合“一个中国”原则,比起德国以西德马克收购东德马克的方式更具低交易成本的优势。

上述关键性阶段均已具备后,亚元的发行与流通便会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 参考文献:

- [1] 侯若石.从地区经贸一体化走向经济全球化[J].世界经济,1996(11).
- [2] 宫占奎,陈建国,佟永栋.区域经济组织研究—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 [3] 王洛林,李向阳.2004—2005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4] 周文贵.北美自由贸易区:特点,运行机制、借鉴与启示[J].国际经贸探索,2004(01).
- [5] 古小松等.中国—东盟知识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6] 胡联国.文化的融合与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J].南开学报,2006(05).
- [7] 高晓雁.日本经济安全战略选择的历史与现实[J].郑州大学学报,2006(06).
- [8] [英] Chang Roberto. Financial Integration with and without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7, 38(3): 8.
- [9]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 [10] 程恩富,周肇光.关于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可能性探析[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3(03).

(编辑校对:余朝锡 金界一)